

书院沉淀的无形遗产更为宝贵

梁凤莲：(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研究员、一级作家)

羊城晚报：在您看来，广州古书院对于岭南的文化教育以及文脉的传承，具有哪些积极作用？

梁凤莲：书院在古代文化史上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两个，一是思想传播，二是应试教育。

从思想传播的角度来说，书院的发展，与岭南学术风气的树立基本上是同步的。古代书院传播思想的途径有三个，一为祀贤，二为讲学，三为藏书。从宋代开始，岭南学术大厦完成奠基，明代南海人郭棐在《粤大记》中将冯元、王大宝、余靖、崔与之、李昂英、郭闻列为宋代岭南六先生，赞叹六先生“真五岭间气之钟灵，百代士林之师表”。宋之后到清，岭南学术风气清朗，大师辈出。但是，仅仅有大师，并不能惠及大众。大师与大众之间，需要一座桥梁，才能将大师的知识、思想传播给大众。百年树人，在过去，书院就是桥梁。

明朝，岭南书院在思想传播方面达到一个高峰，以湛若水等为代表。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归纳，湛若水一生建书院23所。《明史》说他“平生足迹所至，必建书院以祀白沙”，用来传播陈献章的白沙之学。南海人霍韬、方献夫也是一样，出为名臣、人为名士，众多理学名儒在赢得自己学、仕两方面成就的同时，也成全了岭南学术独树一帜的盛况。

羊城晚报：如今，广州古书院大多难寻踪迹，只留存于文字档案里。在新时代，我们应该怎样发挥古书院的作用？

梁凤莲：书院的消失是社会进步的产物、时代

发展的需要。我们回顾过往，在看到其历史价值的同时，也要一分为二地客观分析书院存在的历史局限性。

书院文化遗产可以分为无形遗产和有形遗产两种，其中无形遗产包括制度遗产、观念遗产、习俗遗产，有形遗产包括文献遗产、文物遗迹等。相比有形遗产，书院在千百年演变中沉淀下来的无形遗产更为宝贵，其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、修身齐家的道德情怀、好学求知的人生态度才是值得永久延续下去的。

羊城晚报：您曾建议，在广州各区保护、传承文脉，比如在越秀区等地打造书院街、书院群落等。具体来说要如何操作？

梁凤莲：是否有必要和有可能打造书院街，要看区域内是否拥有相应的文化遗产。传承性保护、创新性发展文化遗产的路径是实现文旅融合。

国内其他城市在利用科举文化、书院文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像南京夫子庙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江南贡院，建立了中国科举博物馆，是文旅融合的经典范例。其具有艺术欣赏、历史溯源、科学研究、教育推广等多重功能，已经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和商业旅游发展的有效载体。

同样，广州也拥有丰富的书院文化遗产。我们可以从文旅融合的立场出发，将书院遗址打造为集展示、研究、教学、交流、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景点，将有利于城市文脉的传承、文化认同的实现。

推进广州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

延伸

今年，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“推进广州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”。早在2022年下半年，广州市档案馆、南越王博物院就接连举办了广州传统中轴线相关展览，带领观众领略广州传统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与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。

相关政策也进一步规范。2022年3月，《广州市传统中轴线(近代)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规划修编(2021-2035年)》公示，其中要求，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新改扩建活动的，建筑高度应控制在18米以内，且体量、色彩、材质等应与街区

历史风貌相协调。今年3月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、文物局局长刘晓明介绍，当前，广州已设立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等工作机构，有序开展遗产地点规划、价值研究、调研评估等工作，初步明确广州传统中轴线的申遗路线。在此基础上，广州争取加快推进中国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。

广州有众多古书院处于广州传统中轴线范围内或周边，它们身上的岁月痕迹以及承载的历史文化，也正可为广州传统中轴线的申遗添砖加瓦。

(本期稿件得到广州博物馆大力支持，特此致谢)

建城2200多年的历史名城广州，文脉源远流长。广州地区盛极一时的古代书院文化，是文脉传承的独特载体，泽被后世。

广州书院有近千年历史，由南宋至清末，广州地区曾出现的书院数量众多，遍布羊城内外。据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及考古发现，广州现存历代学官及遗址4处，历代书院及遗址20余处，历代书室、书舍、家塾等遗址280余处，历代宗族(祠)书院及遗址近20处。

200年前，在广州城制高点——越秀山及其周边，一批闻名全国的书院——学海堂、菊坡精舍、应元书院等陆续设立，成为明清以来南粤各地顶尖学子求学之地。如今，这里既是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的起点，也是千年羊城文脉所系，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的珍贵文化遗产。



万木草堂内景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实习生 宋骥才 通讯员 任海虹

广州古城文脉绵延 书院林立蔚为壮观

广州地区的书院始创于南宋，至清末已绵延700余年。《广州古书院》(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编，2022年)记载：据不完全统计，自南宋至清末，广州地区书院、书室家塾及宗族(祠)书院至少有456所，创建或早或晚，规模有大有小，有学官、官办书院、民办书院；有正统学校功能的书院，也有宗族(祠)性质的书院，还有兼具家族祠堂和学校功能的书室、书社、家塾、学堂等。

南宋时期，程朱理学兴起，朱熹等大儒强调“格物致知”“知行合一”的教育理念，倡导独立的学术探索。在这一学术思想的影响下，书院应运而生。广州地区的书院也由此兴起，“当时创建之动机，一方面为纪念被贬谪到这里的名儒，流风余韵，建书院以资敬仰；一方面为当时官吏或乡儒所亲手创建，用以讲学者”(刘伯璇：《广东书院制度沿革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)。此时，广州计有玉岳、濂溪、禺山、菊坡、番禺等数座书院。据广东文史学者、《广州传》作者叶曙明在《儒林芳草：广州书院史话》一书中记述，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(1224年)由番禺人梁百揆创办的禺山书院(位于今广州北京路城隍庙西侧)，是广州历史上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，它与其南数百米的广州府学、以东数百米的番禺学宫一起，形成了广州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文教区。

在元明更替的战火中，广州地区教育机构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，大多毁于战火，名存实亡。到明代，国家重视兴学育才，出现官立书院的形式，“知府知县莅临郡邑，多以创建书院为良吏政绩的表征”(刘伯璇：《广东书院制度沿革》)。府学、书院等蓬勃发展，无论城乡，多有建立。岭南著名理学家陈献章、湛若水、黄佐等人纷纷立说讲学，创办书院。此时，广州计有崇正、明诚、晦翁、白沙、粤洲、莲花、白云、天关、甘泉等至少30座官办及民办书院。

清初政局未稳，一度在全国禁止创设书院。但随着政权渐趋稳定及皇权教化的需要，在清廷“赐帑千金”的支持下，书院在全国逐渐恢复。康熙至光绪年间，广州不断有书院建立，至鸦片战争前后盛极一时。其中有名的，包括番禺、穗城、越秀、越华、西湖、羊城、应元、增江、圣洲、羊石、文澜等官办与民办书院(《广州古书院》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编，2022年)。

除了这些正规的公立私立书院外，清代广州城乡还有众多的宗族(祠)书院(或称“姓氏书院”)，比较著名的有陈氏书院、何氏庐江书院、朱氏考亭书院、苏氏武功书院、梁氏青云书院等。它们实际上是各姓宗族在广州建立的合族祠，以书院命名，“原为本姓弟子应试居住及合族受屈讼输粮往来寄寓”(《清介书院家塾同例》，清咸丰三年广州西湖路致文堂刊本)，可见其建立的目的，与教育有相当关联。此外，还有诸多分布城乡的家塾、书舍、书室、书塾、学堂等，亦属于宗族书院性质，虽不能等同于正规的公立及私立书院，但均具备较好的文教功能，与教育有着密切联系。

阮元、张之洞督粤期间，大力发展经济，在广州创办了学海堂、广雅书院等新式书院，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精英，岭南人物蒸蒸日上，广州俨然成为全国学术之中心。这两处书院成为广东教育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亮点。

越秀城内 书院奇观

回看广州地区书院发展史，位于当今越秀区内的广州古城(以下简称“越秀古城”)古书院群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。

在明代，设在越秀古城内的书院约有11间，包括创建于1437年的崇正书院、创建于1531年的白沙书院等。这些书院都名噪一时，其中尤以湛若水所建的天关书院最为著名，心学传人湛若水在此讲学，吸引了大批士子追随求学；而粤秀山(现称越秀山)附近又兴建了多间书院，为粤秀山在清代成为广东学术中心打下了基础。

《广州越秀古街巷》(广州市越秀区文联编，2013年)中记载：“在清后叶，以广州府衙为中心，半径一公里范围内，集中了三所学宫、五所省级书院、一所府级书院、二所县级书院。还有在今大南路、大德路以北，解放路以东、文德路以西，中山四、五路两旁，大小马站、流水井一带云集的数百家以姓氏命名的书院、书室、家塾、家祠，街巷连片，书声相闻，形成高密度的古学奇观。”

随着清末全国学制改革的推行，越秀古城内书院相继停办，但也有不少书院改办为新式学堂。

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，书院基本不再承担教育功能，大多被改建成大杂院供人居住。有的改建为校舍，因拆迁、改造、征用而被毁弃的亦有，曾经著名的大小马站、流水井书院群落也日渐没落。进入新世纪之后，不少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呼吁重视羊城古书院风貌，对其进行保护与活化。一方面可兴建古书院博物馆，保持部分历史记忆，另一方面可以借鉴书院教育模式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。

随着近年来各级政府日益重视对广州文化核心地资源的保护，一些现存的羊城古书院获得新生。像清

代，广东各级官府都参与办学，越秀古城区内创办的书院规模愈来愈大，质量也愈来愈高。据学者统计，清代越秀古城内建立的书院(不包括宗族/祠书院)就有13间。这些书院在广东书院发展史、学术史及教育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如省级的粤秀书院、越华书院与府级的羊城书院并称“广东三大书院”，汇聚了数千人入读，精英荟萃，堪称清前期广东教育的重心所在，而县级的西湖书院、禺山书院也不遑多让，竞相聘请名师授徒课业，成就者众多；其后在粤秀山的学海堂、菊坡精舍更是掀起了广东书院的改革风气，使广东书院趋于讲求实学，开创了晚清广东朴学兴起的新格局；加上只招举人肄业的应元书院的创办，粤秀山俨然成为了广东的学术与文教中心。

越秀古城内借着区内书院的兴盛，聚集了大批优秀人才，刊刻了大量书籍，使之在清代成为广东的文化教育中心，在清中后期更是全国的学术中心之一。这个地区还连带起文

群将以全新面貌呈现。2023年2月，广州市发改委印发的《广州市2023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》等文件中又明确，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分为两期，其中一期工程项目计划对位于教育路以东、大小马站路以西、南方剧院以北一带书院群进行修复建设，占地约1.5万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；二期工程项目位于中山五路以南、教育路以东、伍权里以北、小马路以西，总用地面积9710平方米，对大小马站书院群进行改造。

保护古老书院，能唤醒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记忆，贯通文化的传承，让历史的沉淀变成广州文化自信的新名片。未来，越秀古城内书院群的保护与更新值得我们期待。

修复改造 重获新生

修复改造 重获新生



广州古城(越秀区)清代书院位置图

倒在办案一线的“拼命三郎”——追忆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古阳

羊城晚报记者 王雷

因公牺牲

“阳哥是我们的好大哥、好战友、好同事，我们很难接受他的离开，至今还给他留着办公桌。”古阳生前同事、现油甘埔派出所副所长杨帅在回忆起他时，眼眶湿润，数度哽咽。而那张空着的办公桌，寄托着同事们对古阳的思念，仿佛他从未离开。

杨帅说，古阳是凤岗公安分局出了名的“拼命三郎”。由于从警经验丰富、工作认真负责，辖区内很多案件“硬骨头”基本上均由古阳阳跟进处理。“他的口头禅是‘快点、快点’。警察的工作虽充满不确定性，但从案件研判到抓捕审讯再到结案，阳哥想的都是怎么尽可能提高效率，早日为群众排忧解难。”杨帅说。

善良正义

“出警有危险时，你们躲在我身后，我体大肉多能挡住。”生前，古阳常常给年轻同志壮胆。但这并非一句玩笑话。现

实中，他身体力行，有危险时总是第一个冲在最前面。

2019年1月5日10时许，凤岗公安分局110接报称，在凤岗公安分局110接报称，在凤岗分局出租屋，一男子有持刀行凶倾向。作为值班民警，古阳马上叫上警务人员，携带钢叉盾牌警械赶赴现场。刚到达现场，该男子突然从屋里冲出，持刀砍向警务人员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古阳一个箭步上前，使用手中盾牌挡在前面，并紧紧压住嫌疑人的手，众人合力成功控制住男子。古阳率队及时果断处置该名欲持刀行凶男子的视频在网上传出后，不少网友纷纷点赞“神勇了”。

面对歹徒，古阳阳勇敢果断；面对群众，古阳阳侠骨柔肠。他深知，基层警务工作虽繁杂琐碎，但如果将自己手中的案件破掉，就是为群

众办实事。

2013年6月，一名老人跑进凤岗公安分局刑警大队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孙子被拐走了。”警情就是命令。古阳阳细心排查关系人，通过现场走访、查阅路边视频监控等，迅速摸清了嫌疑人的藏匿地点，并马上带领工作小组连夜赶赴惠州实施抓捕。这时，古阳阳胸口突然一疼，他没有丝毫退缩，实在疼得受不了了，就猛捶胸口两下，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冒。同事劝他先去看医生，他却说：“小孩还没有救出来，时间就是生命，分秒不得”。最终，古阳阳带领团队于案发后12小时内成功侦破案件。

“单看他的外表，感觉这个人好像很严肃。但实际上他心思细腻，为人很善良，正义感爆棚。”朱广发说，古阳阳在审讯嫌疑人时，不仅仅只是为了破

案，通常还会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，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。

邓某强是凤岗人，本来家境尚可，自2011年染上毒瘾后，家境一落千丈。2015年8月，邓某强因经济问题殴打妻子，古阳阳得知后及时出警调解。调解完后，古阳阳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邓某强一家，“你们有困难随时找我，吵架解决不了家庭问题”。后来，古阳阳还隔三岔五上门找邓某强谈心。在古阳阳的帮扶教育下，邓某强彻底戒掉毒瘾，并成为了一名禁毒志愿工作者。

梦想延续

“阳哥是平易近人、乐于助人、好民警，我们到现在还不相信他真的走了。”采访中，古阳阳的领导、同事以及接受过

他帮扶的群众均为他竖起大拇指。据统计，从警18年来，古阳阳先后参与侦破各类刑事案件320余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980余人，曾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，还多次被评为群众安全感和公安工作满意度先进个人。

古阳阳出生在一个警察世家。他父亲曾是深圳的一名民警，因积劳成疾，十几年前患病离世。“阳阳是独子，从小受家庭影响，嚷着长大要当一名警察。我们一家两代都为公安事业献身，我很自豪。”谈起古阳阳，年逾花甲的母亲也掩面而泣。

记者了解到，古阳阳和爱人育有两子，如今大儿子15岁，小儿子7岁。“他经常和孩子们分享当警察的那些事，这在孩子心中埋下了梦想的种子。”黄文映说，自己大儿子曾说，长大后也要和爸爸一样，做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。